

## 西藏造反派文革史——陶长松口述自传

陶长松，原西藏研究所副所长，文革时曾经是西藏“拉萨革命造反总部”大名鼎鼎的总负责人“陶司令”。



图片

以下内容均来自西储大学藏研所收录的 2001 年对陶长松的访谈录音。由于录音质量较差，可能部分地方有些错误。

### 少时学霸

陶长松 1938 年出生于江苏扬州瓜洲县的一个贫农家庭。祖父是一名上海大陆银行的职工，当过邮差和锅炉工；父亲读过几年私塾，当过会计和账房先生。而他本人小时候成绩优异，甚至凭着出色的成绩得到了大陆银行的资助（大陆银行在当时会给职工成绩优异的孩子进行补贴）。

虽然当时我们当时家庭条件不好，但我还是刻苦勤学。当时瓜洲中心小学 100 多个学生去考扬州中学，考起的只有五个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后来考大学，基本上全部都要报考华东师大。考起华东师大的也只有五个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
刚才跳过了一个，就是我的高中...我这个人原来是喜欢数理化，所以我考的是工科，考的是南京工业技术制造学校。这个时候调皮捣蛋，结果在南京考试的时候我们几个贪玩，累了睡着了。考数学的时候我们迟到，结果老师不让进，后来我们给他说好话，让我们进去了。我问老师这个卷子怎么答，老师也不耐烦了，我们也没搞清楚。后来我没考起，我就写信问，跟我讲这个录取分数线 370，我的分数是 368，差两分。考试成绩还公布了一下，数学零分。我说开玩笑，我数学最好怎么可能是 0 分。他说也许你的卷子答错了，可能答到草稿纸上，没答到卷子上。后来我就去了江苏艺术师范学校，在江苏也很有名气的，就报考它。扬州考区只录取一个，我是第二次被录取上的。

所以我的成绩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可以。高中毕业后，老师说我们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可以保送。恰恰我祖母不同意，到上海来回有好多路费，就在扬州考。音乐老师、艺术老师、数学老师都挺喜欢我的，喜欢我的老师不少。

华东师范说句老实话我刚开始也没想考。当时我想找工作。当时每所艺术学校都要选派一个

毕业生支援新疆。我就被我们学校选上了，去新疆工作。当时各种文件，工资表都来了，我说：“行啊，工作都有了，还考什么大学啊？”班主任说：“不行，你现在还不能去。你先去考大学，考不起再去。”我就答应了，结果还考起了。当时我很调皮。我在江苏艺术学院是绘画板的，学画画的，但是我大学考得是中文系。考试老师就问我：“你不是艺术学校的吗，你怎么考中文去了？”我说我就考中文系，考不起就考不起。当时我还是应付了一下，音乐呢我还是加试了一下，我问老师加试啥，老师说：“就加试二胡吧。”虽然我是学画画，但我还是拉了一首曲子。老师就感兴趣了，问我：“你还会什么？”我说我还会钢琴，再弹一段钢琴。所以后来我就考取了中文系，只录取了我一个。当时我很调皮，老师要我干什么，我拼命地反其道而行之。当时要我进音乐班，我说：“不行，我要进理科班。”他们要我考艺术系，我就考中文系。结果我都考起了。

问：读大学的时候你喜欢读什么书呢？

答：到了大学我读的书很广，中国的经典名著和外国的名著我都看。也不是为了研究，是为了好玩。学校里田径队有我，民族乐团有我，版画俱乐部也有我，钢琴部也有我。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挺有名的。我当时是有名的田径运动员、二胡专家—原来上海管乐团的来找我。但是我没有去，我觉得把这个作为爱好玩玩可以，但是作为专业不行。

问：您是哪一届的？

答：我是 56 届的。所以我到华东师范大学有运动会，我拿了 1500 米的冠军。田径队的队长马上来找，问我哪个系的，我说我中文系的。他说：“行行行，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田径队？”我说：“愿意愿意。”我就加入了。民族乐团也找上了我，他们对我还不错。他们把每个人分批次考试，他们问我会什么乐器，我说会二胡，就给我拿了一把二胡过来。然后考了一下就把我接受了。当时中苏关系还不错，我也很喜欢俄罗斯电影比如《静静的顿河》，但是后来就被批判了。虽然批判了，但也挺好看的...

而正是这样的性格也让陶长松没有在条件更好的内地发展，而是去了西藏，并且在那里将他的人生推到了新的高潮。

为人师表

问：陶老师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的是汉语，您怎么学的藏语呢？

答：这东西怎么说呢？对语言嘛，我一般还比较感兴趣。当然这只是一方面，最主要的还是工作。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，61 年我来西藏没多久，就筹备了师范学校。师范学校基本上都是藏族同志，没几个汉族的。把我分到那里去当班主任，当班主任我一个人不行，有两个，一个汉族一个藏族。那个藏族老师不懂汉语，所以我得学藏语。然后第二年回拉中，就叫我当一个新班的班主任。你想刚从小学到初中的，根本不懂汉文，逼着我去学。为了鼓励我的学生，我说：“我没学过藏话。现在我们来个比赛，你们见到我必须说汉话，我见到你们必须说藏话。”一下子做不到，反正憋吧。原来我访问学生还需要翻译员。后来就逐步地不需要了。

当然我给你说个笑话。因为藏语有敬语，所以我跟家长说话先来一句：“我不会敬语，请原谅。”得先说这句话。免得闹出笑话。家长们也不在乎，反正我来了他们也很高兴。“谢谢老

师的关心。”都说这些话。

问：陶老师您能不能讲一讲混得有出息的学生？

答：混的有出息...这个东西怎么说呢。按着座位来讲，现在反正有好几个部局级的。

问：他们是？

答：：气象局局长索朗多吉，是我班上的学生；嘉央爪八（？），四川航空公司西藏管理局的什么书记；还有一个“援藏基金会”的京米（Jingmi）。

问：哦，他也是你的学生。

答：是，次仁京米。还有妇联的副主任次仁措姆。还有好几个在业务上也是骨干。

问：哪几个？

答：旺堆。

问：报社的？

答：不是，是词作者，歌舞团的，写了很多首歌。次仁多杰，画画的。还有 Wangnan 和 Pingnan 都是我的学生。我的这些学生经商的，像什么薛桑啊、图桑益西啊、魏佳华（Wei Jiahua）啊等等。还有原来水利厂的厂长图登，什么皮革厂的厂长...这些都是我的学生。他们都觉得原来的老师很负责、纪律性也很强，真正让他们学到了东西。当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批评，当时给的条条框框太多，以至于对这个市场经济不太适应。（笑）就是捞钱嘛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当然总的来讲他们还是不错。对国家、对社会、对人民，无论能力大小，都能作出各自的贡献。

问：陶老师，您一生中最得意的是什么？

答：嗨，最得意的事情...这东西不好讲。

问：不是说政治上的，是说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。有没有...

答：作为教师来讲，最得意的就是学生。不仅是我现在学生这么说，现在自治区领导也说了：“感谢拉中的一批教师培养了一批人才。”就是昨天丹增书记说的这番话。就是“拉中这一批都可以，都是各个单位的骨干，都能挑得起重担。可惜省级干部没有他们。”（笑）省级干部一般都是民院（西藏民族学院）的。他说这样的话就不错了。作为教师来讲，我最骄傲的就是我的学生了。

风云突起

问：毛主席讲话后，文化大革命就正式开始了。您当时是在拉萨中学，可以讲一讲当时的情况吗？

答：我记得当时是 66 年 8 月份。当时红卫兵在全国已经是风起浪涌，但是拉萨呢好像也不落后。所以也建立了红卫兵。又怕呢，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自发弄不起来，又怕出乱子。所以呢当时我虽然也二十多岁，但是也作为了红卫兵（笑）。我实际上就是红卫兵的头儿了。

问：在拉中吗？

答：在拉中啊。

问：你当时是什么职位？

答：我教师啊。我在拉中当教员，我中文系出来的教语文，其它的课也教。我们学校的学生一个是少数民族占绝对多数，就怕这些学生呢不知道方向、乱来。所以呢当时拉中的党支部选派一些年轻的教师加入，作为红卫兵的头儿。“破四旧”也是我带着他们去的。有一次印象很深刻—进驻大昭寺。当时我感觉很害怕，大昭寺是世界闻名的寺庙，你进去干什么？砸菩萨吗？但是学生们控制不住，他们进去了，我也进去了。

结果很快，区党委就跟我谈话，我立即跟学生说“停”，你们不要乱搞，我谈过话回来之后再跟你们说。当时是张再旺，张再旺部长嘛，就找到我说，“陶长松同志啊，现在跟你交代一个很重要的情况，周总理来指示了。大昭寺决不能破坏。听说你们拉中的学生已经进去了，一定跟他们讲要保护好。”

这样讲以后回来马上跟学生们传达这些东西。学生们也很听话，只要是中央的声音，不管是毛泽东的，周恩来的，都是威望很高的都听。所以也就停止了。但是外面的“破四旧”的东西管了也没用。只要是有人磕长头，我们就立即“啪”的一下往他们背上贴传单。

问：这是什么样的传单？

答：破“四旧”的啊。意思就是不准磕长头，这也在四旧之列。人们看到后就慌了，很快就不磕长头了。

问：当时拉中红卫兵有多少人？什么时候组织的？

答：具体日子也搞不清了，大概是 1966 年 8 月份，很快就组织起来了。北京的红卫兵组织的比我们早，大概 5 月份 6 月份，我们是 8 月份。当时两个影响比较大的红卫兵，一个是拉中的红卫兵，一个是师校的红卫兵。

“拉萨革命造反总部”的框架

问：有多少个“司令部”？

答：有九个“司令部”。

问：？

答：这个我说不清楚。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司令部，大修厂，什么什么学科所那就是第一司令部。第二司令部呢就是西郊，保养厂和汽车队。第三司令部就很怪了，包括了林芝和藏丁厂。第四司令部是居民，几个办事处的。

问：哪些办事处？

答：当然，我们的实力主要是工人。所以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是我们实力最强的。当时要解决吃饭问题，他们可以运输啊，所以更看重他们。另外一个问题是武斗，武斗发生了怎么办？我们对面有部队、有武器，我们没有。我们保养厂和汽修厂自己制造武器。当时他们最害怕“三点式爆破法”。

问：“三点式爆破”？

答：就是小炸药包带动大炸药包，那家伙丢出去威力够大的。

问：是怎么做的呢？小炸药包带中炸药包，带大炸药包？

答：实际上有两个环节。点火我们小炸药包，然后启动大炸药包，把大炸药包抱出去。需要相当的技术，而且如果目标太近容易误伤人。就叫做“三点式”。

问：这谁做的呢？

答：都是原来的老兵嘛，都是部队上的。他们是作战经验，训练有素。所以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的技能也派上用场了，虽然有时候会失败。大修厂以前试着造大炮，但是炮弹在炮膛里燃了，炸死了几个人。没办法，我们只能开追悼会啊。他们死的光荣。那是在1968年。至于用枪，根据我的记忆，我们首次用枪是在1968年1月18号。

问：发生了什么？

答：就在流沙河上。当时我们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眼睛被打下了一只。

问：是真枪吗？

答：是真枪。这样一来大家就紧张了。但是我们技术有限，那些枪都没有来复线，打不准。反正心理上有一种安慰嘛，我有我武器了。当时，还有我们自制手榴弹。那个比较简单，但也有些问题。一般的它要通过七秒钟才能爆炸。但我们的导火索一两秒钟就爆炸了。有时候你还没出手，手上就爆炸了。当时确实有人就这样死了。我们感到很沮丧。这种情况就很恼火了，只好参加追悼会。对他们的亲戚表示慰问，宣布他们捍卫毛主席的路线死的光荣。当时大家都不是很滋味。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死了，你能怎么说？

问：当时你说九个“司令部”。第四司令部是怎样的呢？

答：这个是居民的司令部。居民只是最基本的群众嘛。当时那个队伍也够大的。要是参加集

会和游行啊，他们也是个主导的队伍。

问：这个人数你们有没有统计过？

答：人数当时没有统计。但是呢，工人当时是占绝大多数。当时有多少人我们也没有统计概念，但是车子基本上是我们掌握的。所以我们游行的时候，游行的队伍非常的壮观，车子多得很。当时老百姓的政治热情也很高。

第五司令部呢就是机关干部了，就是区党委啊，人大啊，这些人...这些都是知识分子。像这些知识分子中呢，区党委书记更喜欢另一派，而不是我们。可能因为他们和首长、自治区领导比较接近吧，感情比较深。所以我们这几个司令部呢，是随时编排的。各个地区呢我们不包括。

不仅是拉萨，比如像林芝（位于康波）属于第三司令部，格尔木（位于青海）属于第八司令部。怎么说呢，它们不算独立地区，所以就和拉萨直接联系、直接挂钩。当时我们就随便排了一下，就排了第八吧，所以这司令部之间的界限也不清楚。

所以【北京的】中央领导接见我们的时候【试图让“大联指”和“造总”同意停止武斗】，就问我们，你们拉萨最近有多少人。我当时也没思想准备就随便回答了一下，根据各地报的，大概有二三十万人。当时中央领导不是批评吗，“你拉萨革命造反总部不是只管拉萨，怎么还管全区的？”我说全区我们也没管啊；他们愿意靠我们。我们跟他们解释了，现在中央不准搞大串联了，但是拦不住。西藏的情况有点特殊。当时我说中央下达了“红五条”，队伍反而发展了（笑）。就好像中央下达了“红五条”后反而推动了我们队伍的壮大（笑）。这么回答以后，周总理好几秒钟都没回答出来。

组织作为

问：刘绍民是南方的，你觉得交流以后你们之间思想和文化有什么区别吗？

答：区别的话，说句老实话我跟他们谈判还是比较轻松的，因为我们要尊重事实。说句老实话，我原来不关心政治，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对中央的指示是记得一清二楚。都是认真学的，记得滚瓜烂熟。一个是中央指示，一个是事实。拿“拉萨革命造反总部”来讲，反正是个革命造反群众组织，民间团体。我们的会议叫群众会议，用现在的话将就是参委会。我们开会的时候一般的干部和老百姓随时都可以闯入我们的会议室。

问：会议室是在？

答：二所啊。他们可以随时出入我们的会议室发表意见。我们没办法，我们跟他们讲我们是在开重要的会议，但是他们就是可以闯进来。我们这边就是这么一回事。但是他们那边就很严格了，一般人不能随便进。再跟你说个笑话吧，在北京“学习班”，我的那个房子是最热闹的，人最多，大家都开玩笑。而刘绍民的房子别人不能随意进。说明我这个人等级没有他那么高。就像群众所说的，“你陶长松有什么了不起，明天我就可以把你拉下来！”我说，“欢迎，欢迎！”所以开会的时候我们这边往往占上风，因为我们有大量的事实，刘绍民他们弄得没那么深入，掌握的情况没有我们深入，群众可以随便来找我。

问：你们开会的时候有多少人？

答：这些都不定。多的时候有 13 个，少的时候大概是 9 个。当然我们也注重群众面貌，像山南的次仁拉姆，第一个穷棒子互助组的组长，是我们勤务组的成员。当然她有好多会还参加不了。像这个贡布，第一次从北部登上珠穆朗玛峰的，毛主席都接见的，他愿意参加。我说，“行行行！”马上就把他作为勤务组的成员。当然了，他这个会参加的也不是很多。但是有机会都还是会参加。当然我之前说过，我们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工人。我们不需要次仁拉姆和贡布承担什么责任，主要是扩大我们的影响。把这些名人吸引过来，但是具体的事都是由我们知识分子和工人说了算。当时不是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吗？所以我讲工人阶级应该当一把手，可是一个呢他们自己不愿意干，再一个呢群众也不答应，所以我就凑合担当主要头头。

问：那你的职务名称是什么呢？

答：就是叫勤务组总负责人。下面的就叫我“司令”。实际上我们就像“巴黎公社”，真的做人民公仆。所以也没有什么名称。就称呼我为“拉萨革命造反总部”负责人之类的。

问：当时还有别的领导者吗？

答：除了我还有一个马凤祥（Ma Fengxiang），是电台的编辑或者记者之类的。还有刚才讲到的刘式壹、荣权华。公安当中呢有个朱瑾尚（Zhu Jinshang），改革开放以后是拉萨运输第四公司的经理。汽修厂的崔绍军（Cui Shaojun），他当时也是车间主任吧。反正工人技术有一套。像杨廷和（Yang Tinghe），保养厂的，也是工人，是修理工。像下面还有什么贡布啊、次仁拉姆啊，还有学生代表像魏志平啊，就这一批人。这个人员变动也比较大，我们原来有个公安警队干部叫力俊（Li Jun）。面比较宽，当然这个组织原则还是不折不扣按照中央指示。（笑）所以怎么说呢，如果是出身不好的，或者政治表现、思想品德不好的，没法加入。总之一句话，中央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，具体做得怎么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。

问：那下面有没有分支或者办事处之类的呢？

答：有啊，反正我们分的比较简单。一个是办公处，现在这些事情啊、对外联系的事情啊都通过办公处。吃饭和后勤也通过办公处，甚至保卫也是办公处负责。另外一个就是宣传组，还有一个是组织组。宣传组很重要啊，宣传毛泽东思想，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当时中央的重大决策都是要通过这个来宣传。组织呢，因为群众组织的变化快得很，一会儿给你增加很多了，一会儿给你退出很多了，所以一个组织需要明确一下。还有别的组织比如专案组，像王其梅和周仁山，这些干部究竟怎么样，我们组织人去调查一下，不能随便乱来。这些是比较大的，像厅局级的干部也要调查。像那个总干事周仁山，一派要打倒，我们这一派是要保的，我们认为还不错。因为我们是经过调查研究的，认为他没什么问题。所以我刚才跟你我跟他私人关系比较好，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了。我们反正不主张武斗，要文斗。

...

问：“造总”里面有没有比较有代表性的藏族人物？

答：藏族的代表人物，当时比较活跃的...马门嘉措。

问：他是不是原来科研所的？

答：对。

问：现在是工会吧？

答：对。他等于是第四司令部的司令，就是我上次给你讲的居民的那个。他代表居民，他是有一套。当时经常找我，说要去居民了解情况，作形势报告。（笑）

问：那时他是哪个居委会的？

答：他是胜利办事处，八廓街的。当时除了他还有仁增、纳增嘛...当时我发现这个人了不得，当时一般的老百姓都不关心政治，他都能发动起来，跟他们了解当前的形势。就是老太婆，几岁的小孩他都知道。比如我带人去大昭寺，很多七八岁的小孩都知道：“陶长松！”我说：“小孩都知道我，这什么意思啊？”老人就更不用说了。所以当时真的是毛主席的号召啊：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，领导革命。”当时真的是家喻户晓。所以马门嘉措是一个很典型的人，也很热心。

我给你讲个小事情。我们有人，大概是第二司令部的，他们偷杀了老百姓的一条猪。就有藏族的小孩来报告：“你们有人偷杀猪！”有人报告，我们一查，真的有这么一回事。我说：“你怎么办？原来解放军的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’你们怎么违反了？赔钱！并且高于市场价格！”马上就让他们掏钱。反正当时偷盗也好，违法乱纪的也好，什么事情，老百姓都会来找我们。当时没电话，很困难，都是走路来、骑车过来。当时一发生案件，很快就来啊。所以群众发动起来确实了不得。当时也有很多好笑的事情。二所...当时也是个藏族小孩来报道，说有人强奸奶牛，我说：“怎么还有人强奸奶牛？”我一查还真的有人干。所以不管是哪些坏事，哪个角落的，马上就揭露出来。所以我想现在治安要是像这样子，马上犯罪就没了。

《西藏日报》夺权与第一次坐牢

：都有。主要力量还是初中生。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都是初中生；高中生比较少。刚才跟你说过了，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历程该怎么回顾？反正我从头到尾全程都参加了，中央发一个指示我们就立即行动。也许精神有偏差，但反正都是跟着走。比如像“一月风暴”，我们搞不清楚，但是报纸肯定这个夺权是正确的。

问：当时是什么时候？

答：当时是 67 年，1967 年“一月风暴”。上海夺了市政府和市委的权，中央肯定了。这个对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。这样一来我们也在考虑，这是中央的指示，怎么贯彻？所以我们很快就夺了《西藏日报》的权（笑）

问：当时报社的人像金沙你认识吗？

答：他们当时老早就靠边了，因为文化大革命首先开始的就是报社。像报社领导金沙，公安局领导朱泽明和高黎义...



问：朱泽明之前来过拉萨。

答：来了吗？文化大革命首先就罢了他们的官。当时我们想这说明这个报社不行了，不是无产阶级掌握的了。所以我们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我们代表无产阶级，我们就去掌掌权试试看把。其实夺权了以后日子也不好过。先是反夺权，然后是动手打架，后来发展为运用武器，最后还是中央发布命令实行军事接管。当时我们夺权只是为了响应了中央的号召。至于后来出了什么问题，中央军委同意西藏军区来军事接管，我们也不太清楚。当时我主要负责报社，然后和军队谈判。我跟他们说只要把中央军委的命令给我们看一眼，我们就交。着军队呢，说句老实话，是有偏向的，他故意不给我们看。他给我们看不就完了。他就故弄玄虚，就是有，就是不给你看。但是后来看这样坚持下去也不行。然后我们就说，“算了，我们相信你们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来接管的，我马上整理队伍出去。”

问：什么时候呢？

答：1967年，大概是2月26日。当时跟我谈判的你应该认识，叫魏科。

问：对。

答：他这个蛮不讲理。我说我相信你由中央军委的命令，马上整理队伍出去，但是出不去了。

问：报社有多少人？

答：大概有两三千人。

问：在这个报社？

答：对，在这个报社。这个东西该怎么说呢？当时大家是自愿来到报社，保卫报社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。

问：您在报社待了多长时间？

答：什么？

问：在谈判之前你在报社待了多长时间？

答：谈判之前...夺权之后我就一直在那儿住着。

问：多长？六个月？

答：那没有，大概只有二十多天，十多天。所以夺权以后，夺权和反夺权的事情头大得很。我们主要发电讯，当然也加一点当地新闻。自己组织人写，甚至我自己也写。你不能报纸上开天章啊（笑）。

所以其实也够紧张的。我们还得找人负责藏文班。藏文我也不懂，但是藏文班的有问题还是来找我。晚上基本上睡不着什么觉。

问：藏文谁负责？

答：我们临时聘请了一些人。藏族同志占多数，也有汉族。经常跟我打交道的是一个汉族。他叫宋德民（Song Demin）。他以前是二中的校长、一中的校长后来到（拉萨）市政协当秘书长。他有问题就来跟我请示请示。我说，“我也不太懂啊！”我说我们还是共同商量把。

我们夺权大概是1月11号，军队26号来军管。谈判之后，他们不让我们走，直到一天晚上中央文革来电。邮电系统有我们的人，可能看到这个电报了。说有好消息了，终于可以解围了。我们一方面在报社举行庆祝大会，欢呼中央文革“2.24”来电，这封来电直到2月26号晚上我才拿到。

问：2月26号晚上？

答：就是相差两天。当时我明年举行了庆祝大会，因为上面写得很清楚，“拉萨的革命群众”，相当于承认我们“革命组织”。这份电报让我们和张国华“三结合”。我们当时很高兴，简单地举行了庆祝大会，还在报社游行了一下。利用这个游行的机会，我们就把队伍整理好准备出去了。但是被拦住了，军队把我们包围起来了。

问：军队？

答：对，不让我们出去。从26号、27号、28号，到了3月1号和3月2号。到了3月2号，我说我们这样下去不行了。一个是不让你送粮食进去，报社的存粮有限，有时一天我只能吃一个馒头。第二就是和内外的联系都被断绝了。

问：一个人都出不去？

答：一个人都出不去。但是他们有时候会放一些人进来，所以报社的人越来越多。吃饭问题根本解决不了，部队又谈不通。所以3月2号我就突然决定，算了，看下来军区要我们一小撮“坏头头”；我说我们哥几个就出去自首吧。我就和几个头头出去，一出去就被部队抓住关起来了。

问：谁的命令呢？

答：那肯定军区的。我知道石伴樵，当时的参谋长，视察过我们，和我们都认识。可以说两句话吧。那家伙趾高气扬，因为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嘛。当时我听说曾雍雅，那个司令员，他后来跟我说，“你知不知道我当时也去视察过？”（笑）

问：那个报社和办公处是不是挨着的？

答：它原来是对着新华社分社后门的。反正我们一出去这个事情就了结了。

问：他们把你绑起来了么？

答：对。他们之前还用高音喇叭跟我们说，只要你们出来，经过我们搜身，我们就让你们自由（笑）。

问：是“大联指”跟你们喊话的？

答：不是，是部队。部队用高音喇叭说这个事情，搞的很紧张。3月2号我们被抓起来，审讯了半天什么也没审出什么来。他说我们很年轻，是上当受骗，要交代你们的“黑后台”。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就是“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”（笑）。我也很希望说出一两个“后台”获得自由。可是我说不出来啊。他们可不是我的“后台”，实际上很多事情他们都要请示我（笑）。

问：他们想让您说谁呢？

答：他们说了一些人。他们说了一些，其中一个张广哲，报社的副总编，金沙下面的那个。一个是刘兆功（Liu Zhaogong），商务部副总长。还点到过团委书记鲍义山（Bao Yishan）。他们点的那些人当时根本支持不了。给你出过什么“坏点子”？你怎么按照他们指示进行的？我说这个东西不好说了，他们好多事情都是请示我的。我制止的他们一般不敢干（笑）。我还记得当时是最高法院刑事法院院长金玉章审的我。

问：他们是不是把您带到军区里面？

答：没有。我们原来是在东郊监狱里面，东郊监狱里可能是待了11天。后来又把我们转到看守所。当时说得很好，“东郊监狱环境太差了，给你们换个环境（笑）。”我一看，我们来到南郊了。他们主要还是想从我们身上挖出一些内幕来。

问：你在监狱里待了多长时间？

答：第一次71天。

问：71天？

答：对，第一次71天，我觉得时间很快过去了。

问：当时公安局有没有发通告，让别人知道这些事情？

答：有啊，我五月份放出来，放出来后我就到街上看到很多战斗队、就是学生刷出了很多标语说，“强烈要求释放陶长松，否则你就公布他的罪行（笑）。”所以当时大家都很有这个热情。其实70天也不长，一些学生很早就放出来了。

问：除了你还有多少被关了？

答：这些东西都说不准确了。我们粗略统计一下100多个。他们这个看守所基本蹲满了。像我们这些是重要罪犯，应该关单间。但是不行了，都是三个人。

问：您跟谁在一块儿？

答：当时跟着我一块儿的有杨汉卿（Yang Hanqing），还有一个是民院的学生。叫张什么...像我们这么重要的都关了三个。当然他们对当权派是毫不手软，有时比我们还厉害。像张广哲这一批地方级领导被拿出去拍照，又是脚镣又是手铐。我们都听得出来，听到脚镣声就知道谁是谁（笑）。

问：他们对你用刑了吗？

答：没有，对我们当时还算客气。我听说当时文化宫有个“百丑图”。我就是首当其冲第一个（笑）。

问：这意味着什么？

答：就是丑化我们，拍张照片。具体的东西（“罪证”）他们也没有。这个东西我也没看，都是听别人讲的。他们就反复给我讲，只要你给我们交代一两个“坏头头”，你马上就可以自由了（笑）。我们相信中央会是做出正确的处理的。但是现在看有点天真。

因为我们知道报社的事情发生以前，青海发生了事情，青海的赵永夫在《青海日报》报社打死了一百多人。当时我们不知道具体情况，只知道部队包围了《青海日报》。所以后来曾司令曾雍雅更我开玩笑，因为跟他比较熟悉，他说，“你们胆子真大。如果当时中央同意开枪的话，你们的命就完了。”（笑）可能是周总理说像青海这样的血案在西藏决不能发生。所以军队就没有开枪。当时他们这个高音喇叭叫的很凶，说我们报社里面有武器。后来我们不是自首出去了吗，他们又说武器藏在水井之下了。实际上后来差了什么都没有。

问：70 天以后他们是怎么把你释放出来的呢？

答：这东西，当时流传了这么一句话，“抓了对，放了对。”（笑）再加一下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，一笑了之。”就这么一回事。原来我跟军区的副参谋长谭武荣（Tan Wurong）交谈这些事情。我说，“你们说瞎话容易啊。当时你们是如临大敌啊，这一批人都是十恶不赦的！现在看来又怎么样呢？”

和张国华谈笑风生

问：你和当时的当权者比如张国华有没有直接的交流。

答：当时还不知道。后来也了解了，可能后来他们对我陶长松也知道了。1967 年张国华被调到成都军区了。中央可能是七月份下的命令，他八月份去的。他约见过我一次，叫他的秘书给我说“张政委想见你，和你谈一谈事情。”后来我就去了，在成都军区 5 号楼见得他。过了好几道检查关。（笑）我进去后，他就跟我谈话说，“长松同志啊，你能不能当我的秘书啊。”我能当什么秘书啊，起码得是文科方面的秘书啊。我说这个事情不是我能说的，我们这个组织得开个勤务组会议，研究了以后再说。老实说他对我还可以。我在那个地方还见到了军区司令员梁兴初。张国华把我介绍给他说是“我们西藏的招牌头头”。气氛还是比较融洽。回来以后，我们就研究了这个事情。但是被否定了，怎么能当他的秘书呢？这个事情就此作罢。

所以我就回答了一下，说这个事情不行，我要服从我们的组织的决定。（笑）

问：你是从拉萨去的成都吗？

答：我是从北京回来去的成都。当时是 1967 年，因为我们被抓了一段时间，不服气啊，所以就到北京上访。我们的资料交到了中央领导手里没有我们也没把握。反正我们也反映过了，具体结果怎么样我们也不管它了，该做的也做了，让中央去决定吧。当时拉萨有很多记者，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和《新华社》等等都想采访我。我感觉情况还可以。我在京西宾馆遇见过张政委，我说请张政委亲临指导西藏文化大革命。我这是客气了一套，其实就是想跟他辩论。他当时说他身体不大好。保洁医跟我讲时间控制在 40 分钟之内，我说绝不会超过四十分钟。当时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也记不太清楚，反正不太愉快。他当时提的一些问题也不是很清楚，到了 40 分钟了，还很激烈。我说算了，刚才说了张政委今天身体不好，只能聊四十分钟，尽管我们之间还有问题，我们还是现在就走。我这么做给他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，因为我是讲理，不是无理取闹。

任荣也到我们总部来过，发生的“6.7 事件”让他当时也下不了台，不知道怎么回答了。还是我出面给他讲清楚了，我说，“今天任政委今天思想准备不足，有些问题坑还没弄清楚。行了，今天到此为止，任政委可以回去进一步思考，下一次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”所以你看，报社的事情是一个大事情。另一个就是震动毛主席和林彪的“大昭寺事件”。这个事情我当时也不奇怪，这是必然的产物。

“6.7 大昭寺事件”

问：大昭寺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看过一点儿，但是...

答：大昭寺这个事情我很冷静，因为这个东西军队支持它。我之前讲过 1968 年 1 月 18 号我们有武器了，当时我很吃惊，怎么会有枪呢？这个东西管得很严的。当时中央下了命令不许私藏枪支，他们怎么会有枪呢？所以我就感到很震惊。像武斗呢，我们这些头头也经历过。开枪的那一天，对立组织动员了些农民向我们北郊进攻，北郊的大修厂啊、汽修厂啊和学科所啊等等。

问：那时什么时候？

答：68 年 1 月 2 号。这一开枪，北郊就告急，叫我们派人支援。我说我怎么支援呢，我们这些人没军事知识，没打过仗。他们问我怎么办，我说，“坚守岗位。”他们说要出击，我说，“千万小心，不要弄死人。”因为当时用钢钎和棍子这些东西，我说决不能杀死人命，出了人命这责任我不给你承担。当时我们也说了，可以把他挫伤，叫他没有战斗力。后来我派了一些人去汽修厂作为增援。人还没去，他们就告捷了，把他们打败了，挫伤了很多农民。（笑）这东西我就感觉问题大了，迟早要报复。因为他有枪，还动员了郊区的农民，结果还没占到便宜。军情表面上中立，实际上倾向另一派。

1968 年 2 月 3 号，他们军区把军旗扛出来了，要跟我们搞“三结合”。我当时很惊讶，他们军区态度怎么变得这么快啊？我到现在都感觉莫名其妙。当然这个历史现在也搞不清楚，留待以后研究。当时他们说他们是诚心诚意的支持你们了，结果你们不要。当时我是总头头，我也控制不了局势。北京的红卫兵那嚼得不得了啊，他们嚼了谁呢？围攻了余致泉，余致泉

当时是军区副司令，负责主持工作。余副司令他那个性格不擅长说，在会上就打瞌睡。我们北京的红卫兵就在那儿围攻，把这个会议弄炸了。他说我们侮辱了军旗，至于怎么侮辱的我们也搞不清楚。后来他们很气愤地回去了。我说这个事情更不好了，军队打军旗出来的情况是很少的，结果不欢而散，走了。

我对当时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。后来2月28号北京办“学习班”，我离开了拉萨。

...

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，就是通过“1.18”用枪武斗，他们吃了亏，再加上2月3号的谈判很不顺利。因我们进攻了张国华，军队认为我们是大逆不道，迟早要收拾我们。再加上后来几次武斗他们一般都吃亏，因为我们工人多，武斗这方面还是强一点。尽管他们有武器，但是结果也不行。你也知道，在打斗的时候这个武器就不一定是他们的武器了，被我们缴获过来了。（笑）再加上我刚刚跟你说的，我们工厂可以制造一些武器。所以看这个情况接连吃了几次亏，军队就打算出手了。当时他们好像还打了中央的旗号，但具体怎么样我们也不清楚。在大昭寺广播站，他们说要接管，你接管就接管啊，你开什么枪啊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大昭寺打死了我们10个。有的肚肠都被打出来了，有的呢，十几岁的娃娃，额头被打穿了，当场死亡。有的肠子被打出来了，有的腿被打断了，还有很多人受伤。

问：当时为什么要争夺大昭寺呢？

答：...他们说他们好像要“军事接管”...当然，他们对这个广播很反感。不仅是在大昭寺，在财经大院他们也是毫不犹豫地开枪。当时我在北京【上学习班】，刘式壹马上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发生了啥。他问我怎么办。当听到消息的时候头脑很冷静，我说：“不要还击。让他打。”你要反抗一下那更完蛋。我告诉他，让军队开枪，愿意打就打，打死多少人我们先不要管，决不能还击。结果，大昭寺打死了10个人，在财经大院打死了2个人。财经大院和第二招待所【“造总”总部】之间有一个通道，那两个人就死在那里。很多人都受了伤。艾雪华，一个照相馆照相的，想拍下军队的罪证，结果背后挨了一枪。没打死他，是打倒了脊柱上的神经，他就永远走不了路...后来中央批示了这些事情，被打死的已经成为了历史，像艾雪华这个事情，我去了748医院。我说这个是中央批示的，他们医院管理亲自跟我谈，说“我们竭尽全力，一定把他治好”。最后他们跟我讲脊柱断了三分之二，难度很大，希望我们理解一下。

当时这个事情处理的还好。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引起，是因为“大联指”一次次吃亏，所以军队就想插手帮一把。但是我们这些人呢，说句老实话，我们处理得还是比较妥当。当然，我们这边的人也比较火啊，有一个人想跟军队干一架。我知道这肯定是不行的。还有的人甚至说我们把北郊的发电站炸了，让拉萨一片黑暗。我说这（他妈）罪行更严重，决不能干。刘式壹当时在电话里也很紧张，话都说不清楚。所以一边我跟他将这个问题，一边跟那些军队领导说他们不像话。但他们装作不清楚。

问：我看资料上说我们当时的通讯技术也比较差劲。

答：怎么会差劲？那是部队装的。

问：我是说你们这边的。

答：哦，我们这个没办法都是电话。我们只能通过邮电局打长途，正好邮电局还有我们的人，还好一点。当时有人提出能不能备用电台能不能开放，控制在我们的手里。我们当时也说了不能用。拿东西用了就会出大问题，我们还是通过正经的渠道。所以我们内部的人说“陶长松硬”就是说这些事情。那战队电台启用了，又成了一条罪状，又说不清楚。

问：您刚才说毛主席和林彪对这一事件很震惊，当时是谁报道的呢？

答：军区报道的。我跟他们讲了，你们不调查这东西，任何过错我们都是没有的。你怎么报？你先报，报了再说，我们在调查。结果就按照他们的报道，主席写了批示。主席批示拖了几个月，拖到了11月4号。

问：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呢？

答：“军队领导不袒护不对所做坏事是国家兴旺的表现。”11月18号林彪也批示了，“主席的批示很重要。是对不对的最大关怀和最大爱护。”你看他们拖了几个月才把这事报告给中央。当时他们也够呛，我们也知道他们为了这事发生了分歧。你说如果我们要是抵抗了，我们就完了。我们没抵抗，就是他们自己的矛盾，最后找了个“替死鬼”，最后把阴法唐弄出去了。实际上不是阴法唐，是任荣。阴法唐没有资格。

问：他当时是某个部门的主任？

答：他是政治部主任，他算啥？但是他们要抛出阴法唐，阴法唐也没有办法。

问：当时您跟阴法唐交流过吗？

答：阴法唐以前讲过的，老是有不同的意见。“6.7事件”以后，他在京西宾馆和我握手说，“陶长松同志啊，真的对不起你们。我向你们的干部和群众赔礼道歉。”我就安慰了一下他，说“这个是历史的经验，吸取教训就好。”我当时就觉得他不是这个事件的负责人。他当时很客气，态度很诚恳。当时主席的批示还没下来，我们是在北京学习班交谈的。

所以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呢，部队对我们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。曾雍雅跟我们讲话说，“原来我们以为‘造反总部’的人不讲道理，后来跟你们接触以后发现你们很讲道理。”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感觉是北京红卫兵坏了事。

革委会的工作

问：说到“造总”，您在革委会的权力有多大呢？

答：谈不上，就像议会一样。有了什么重大事情就开会。权力有时也比较大，比如研究杀人的问题的时候，但你要说权力，其实什么权力也没有。

问：您平时是在拉中工作？

答：平时在拉中工作。

问：那用现在的话来讲您当时是什么待遇？

答：没什么待遇，我工资 91 块钱就是 91 块钱。我到军队去，虽然他们的标准不是很高，我在那儿吃东西照样要交钱。一天的伙食费是一块三毛七，首长不让我交，我说：“不行，必须交。”和我们的工资相比一块三毛七也不少了。

当时有的人就不满意了，“吃的是猪狗食，干的是牛马活。”（笑）这样形容我们的待遇问题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当时很想发扬巴黎公社的精神，当时有个上海牌的汽车接送我们开会。我说：“算了，你自己回去吧，我骑自行车去。”反正我一般不坐这种车，都是骑自行车去。

问：说道巴黎公社，陶老师你最喜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哪本书？

答：这说不上，我只读过单行本，像大部头《资本论》我都没系统读过。都是一些短文章，都是针对当时实际问题的看一看。当时我们比较重视“甘当人民的公仆”。我们也愿意积极地尝试去这么做。所以虽然我当时工资只有 91 块钱，还是原来的工资，但工作还是积极地去。当时我们事情比较多，尤其是我们这一派的，必须我们去处理。军区说话也不见得管用。比如，【我们的人】用汽车堵住军区的大门口，他们做工作没有啊，只好我们去跟他们讲清楚利害。“问题要解决，但是你们这么干是不行的，影响工作。”动员驾驶员打上气，把车开走。这种事情多的很，不断地处理这些事情。当时大家都很考虑待遇没有？一般都没考虑这些，当时大家都很乐意，好像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...（笑）当官就是人民的公仆。现在想来也很可笑，没那么简单。

## 第二次监狱生涯

问：您说您第一次被关监狱关了 70 天。那么您一共被关过几次监狱？

答：两次。还有一次是“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”，这是一次真正的考验。

问：什么时候呢？

答：那是 77 年 8 月 4 号。

问：关了您多长时间？

答：那时间比较长了，一年半。

问：查的是什么事情？

答：那东西很明显嘛，就是你组织上跟四人帮有联系。主要是组织上的联系，思想联系他可以随便说嘛。“思想联系”你是跟着江青呢还是跟着毛泽东呢？谁也说不清楚。都是中央的指示，中央的文件出来的。所以他查我们主要是查这一个联系。所以他们审讯了好多，我刚从飞机下来，一下飞机就有专车接送。



问：1979 年？

答：77 年，76 年不是“粉碎四人帮”吗？77 年 8 月 4 号我从成都过来，我当时就发现已经是异常了...

问：您是休假还是？

答：休假。我当时住在亲戚家，就感觉到了异常，我说“不行，不行，还是住招待所吧。”要是在我亲戚家动手可就不好了。这东西已经是明摆着的了，都出现了些征兆。5 月 3 号，党给封克达下了个批示，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，对他隔离审查。我们的人当时说任荣这一次还不错，还按照中央的指示办。当时我就跟他们讲“你们说错了，不信你们看。”任荣的主要矛头还是我们。你看 5 月 3 号对封克达下了批示，把他隔离了。6 月 2 号，他们就抓张榜伟，张榜伟原来是电台的一个记者。到了成都。张榜伟原来动了阑尾手术，在家养病。当着全家人的面，把张榜伟抓起来了，五花大绑。你就随便带出来嘛，带到汽车上不就完了，到汽车门口上个手铐也可以啊。当着全家的面五花大绑，这是队员告诉我们的。这是 6 月 2 号。6 月 11 号，到了成都跟我讲马玉峰（Ma Yufeng）自杀。他是报社的笔杆子。我说事情复杂了，马玉峰绝不会自杀，非常开朗地一个人。他都准备内调了，东西都托运完了。当时我就说“他杀”，但是也没证据。反正就是通过这些事情看到了问题，矛头还是指向我们这些人。我说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。

所以后来事实证明我正看法是对的。8 月 4 号刚下飞机，可能就是公安局的人跟我说，“你的车子准备好，跟我们的车子走吧。”还帮我提行李，我说我自己提的动。就上了他们的车子。

问：把您带到哪儿去了？

答：先是我拉到曲水大桥那个地方，车子就在那儿停下。车子后面出来了个毛卫华，当时教委的。他从后面跑上来跟我宣布区党委的决定，“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，有的是罪行。对你进行拘留审查。”说完就跑，我说，“你别跑，我还没表态啊！”他不管，他就跑。然后就把我拉到看守所。

问：是哪个看守所？

答：是四处，北郊啊。

问：是那个吗，挨着三中那个？

答：北郊，挨着电机厂。

问：是成都监狱吗？

答：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挨着电机厂、学科所往上。成都监狱是第一监狱，我那个是看守所，他们也叫四处。

问：他们把你关押后，他们什么时候找你谈话或者交代问题？

答：马上来医生给我检查。检查问题不大，马上来审讯。

问：立马？

答：立马，立马。一开始他们这个东西一天三次，上午、下午、晚上。晚上有一次我跟你们讲，晚上八点钟开始，凌晨四点钟结束。都是车轮战术、疲劳战术。

问：早上八点钟到晚上十点钟？

答：不是，是晚上。上午和下午都搞过了，晚上还搞，八点到四点，八个多小时。我给他们开玩笑，我说，“算了，我一个人陪你们七八个人很值得。我说算了吧，我看你们都打哈欠了，休息吧，明天再说。”当时毛卫华也打哈欠了。我说了一下大家哈哈一笑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当时负责的是公安部刚调过来地一个人，叫王义光（Wang Yuguang）。他不是西藏的人，好像是高升了一两次就缩了。我说你好像是内地调过来的，好像还公安厅的一个头头。（笑）他跟我拍桌子说，“你怎么知道！”我说，“我怎么不知道？公安厅哪个头头不认识，就不认识你。”他为什么慌了呢？因为他认为监狱里有我的帮派体系。后来有人跟我说“陶长松你来之前，监狱的人都换了，就怕有你的人。”

问：你在那儿关了多久？

答：到 79 年，一年半。79 年元月 25 号。

问：当时您跟外界有没有什么联系？

答：没有，他们不准。

问：包括申诉的机会？

答：哎呦，这东西他不上申诉。

问：就是您能不能发表您个人的意见？

答：个人意见就是他们审讯的时候说。

问：全部通过他们？

答：他们也没有判什么刑，也没列出什么罪状，你能申诉个啥？所以只好耐心等待，一开始很热，希望马上撕开一个缺口。结果也没什么油水，所以很长时间也不问了。不问了，我就主动提出来，说“有些问题我们还可以谈一谈。”（笑）他们也很高兴，谈一谈也没有啥。最后我跟他们说他们也不理了，他们不理我说也好，说明他们把油水拧干了。（笑）他们查我陶长松的组织名字也查不到。

当然他们也知道一些情况。他们知道我去了上海，说我肯定和王洪文接触了。我说，“那是你们的想象。是有人建议我跟王洪文接触，但是我没有兴趣。我对外界不感兴趣，在北京包括蒯大富我都没接触过。”什么“五大领袖”我都不感兴趣

...

答：但说句老实话我还是先做检查，不检查这东西也是不行的。但是内部的人我不客气，我说你们写检查，（他妈的）这东西是你们的责任。但是跟中央谈我愿意承认，我负责。所以他这个下的功夫还是大的，内查外调，线索弄了不少。实际上我为什么能和王洪文联系，他们也不知道。实际上是军区造了一些毛主席纪念章。一些团级干部找我说，“你能不能跟王洪文说一说，价格可以便宜一点。”我说不行，这事你们自己去谈，自己去联系。像这些情况他们都没有掌握。

问：那 1979 年您是以什么名义出狱的？

答：没有。我当时是 1979 年元月 25 号被释放。他们是元月 23 号找我谈话。好久都没见到的王义光、还有一个一处的处长刘文宗（Liu Wenzong）和看守所的副所长找我谈话。态度的特别好，还问我衣服穿好了没。我说衣服这东西还要你说吗？肯定穿得好了。监狱里还没有电灯，只能点蜡烛。他们说，“怎么样，你待在这的时间够长了。”我说，“时间够长的了，但是不能让你们满意。有些问题老是说不清楚。”（笑）王义光笑眯眯的，“你的问题嘛也基本上说清楚了。今天晚上跟你说吧，区党委已经决定了，让你回家过年。快了明天，最晚后天。你知道后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，“后天是除夕，回去过年吧。”我说，“我不着急。既然已经待了这么长，长的都快一年半了，那么着急干啥？你们把那些材料、结论赶快弄一个给我看看。”他说，“不着急，不着急，这个结论的事情随时都可以搞，先回去过年再说。”我一再坚持，既然都待了一年半了，就得有一个结果。他们也不谈，只是再说一遍“最快明天，最晚后天。”我说就回去休息吧。第二天没有消息，第三天强行把我的衣服包裹好，叫我走。我就很不乐意啊，我说，“你没有结论是什么意思啊？”我就跟他们磨蹭，我就问，“你们看守所的棉衣和衬衣要不要还？”他们说，“不还了，不还了。”我也跟他找事，我说，“我那个腰带断了一根找你们补，现在也没给我还。还有钢笔在办公室丢了一支。”“赔你，赔你，都赔个新的。”强行把我弄上汽车，是公安厅的车子把送回去的。

问：把你送到哪儿了？

答：送到拉中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拉中党支部抵制不让送过来。说你把他放过来，我们怎么办？第二天跟他们商量，商量不通。说把我放回来，他们日子就不好过了，鸡犬不安。结果王义光就发脾气了，说，“你们懂不懂法律？”所以 25 号他们没办法，自己派车子。现在应该可以说了吧，我在看守所的时候审讯了大大小小 183 次，批斗会开了 20 次。

问：大会批斗是在哪开的？

答：在最大的体育场啊。9 月 4 号...

问：哪年的？

答：就是 77 年。我这个还有点复杂，我 8 月 4 号回来，他把我弄了，把我弄到看守所。他们没让我住在监狱里头，而是住在监狱外头的一排房子，给了我们两间房子。还有专案组成员，外面还有人站岗。他们得等中央批示。当时听他们谈话我都听得出来，8 月 25 号中央来的批示。因为起先他们不能把我当成罪犯，但是批示下来以后说话越来越难听。就是 8 月 26 号开始，他们硬了。

问：是谁批示的？

答：中央批示的，就是撤销我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，把我隔离审查。拖到 9 月 4 号，在体育场开了个几万人大会。

问：有没有封克达？

答：没有。他们给我还戴上了手铐。

问：跟您在一块儿的还有谁？

答：就我一个人。我那个监狱那一排，我看看...1、2 号是张学尧 ( Zhang Xueyao )，后来就被枪毙了。我是住在 7、8 号。都是套间嘛，还有小院子。( 笑 ) 张学尧很快，他是 77 年 3 月 28 号枪毙的。( 整理者注：张学尧原为拉萨市财粮局科长，1977 年 11 月 28 日以“反革命罪”判处死刑，实际枪毙年份可能为 78 年。)

我是八月份回来的，25 号批示，9 月 4 号开大会宣布拘留审查。这是要制造一个声势。所以全国唯一的清查“四人帮”时枪毙人的事发生在西藏。西藏很多情况都是很特殊的。

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后，他们告诉我说张学尧态度恶劣，但是罪行不大。这就是为了营造一个声势。

问：他们是在向您施压。

答：是，我说，“你们有权力枪毙他，至于你们凭什么枪毙的，可不可以说给我听听？”他们不敢说。我说既然人枪毙了，罪行也可以说说嘛。实际上我是试探，他们心虚了，就是凭借自己的权力。正好 77 年省市自治区有了这个权力，他们就钻了这个空子。所以我做了这个思想准备，当然我这个他们必须通过中央才能动手。( 笑 ) 他们就是这么想的，想杀鸡给猴看，让大家都害怕。

正是一个月以后给我宣布的。有过一个月，他们给我宣布张榜伟，就是刚才我讲的得了阑尾炎的那个人，说他问题很严重，但是态度很好，我们就把他释放了。我说张榜伟有啥好严重的，我都不知道。因为这些情况我也很了解，他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啊？

问：张榜伟是？

答：刚才给你讲的，电台的记者。

问：他还活着吗？

答：是，他还活着吗？ he 现在是四川大学的教授。我说， he 就是说了一句话嘛，“他有权首先就枪毙任荣。”我说对方那个杨赵峥（Yang Zhaozheng）有权就先枪毙曾雍雅，抓都没抓嘛。有什么问题？大家都在说气话。我说就这么个问题嘛，还有什么问题？他们就不吭气了，他们谈具体的事可能还没我说得清楚。

出狱之后

问：您回到拉中以后事情怎么样了？

答：回到拉中以后呢...西藏的事情就这样，他们也看中央的风向。因为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他们有震动啊，“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”啊，他们害怕了。他们知道自己不是“实事求是”，捏造了很多罪名，所以就迫不及待地放人。但是能判刑的也赶紧判了，像魏志平。他什么问题呢？家里有自制手枪。我跟你讲过的，没有来福线，根本打不准。就凭这一条判他三年。能判的都判了，像我们这些没问题的，他抓不住，只好放了。

79 年我放出来逍遥自在，但是他们还是会搞一些小动作。比如把我调到六中，一会儿说调到五中，我说，“管你调到那个学校，我都不会去的。你先把我的结论弄清楚再说。”如果是其他人，老早就降扣资了。我说，“你扣，我没关系的。不为难你。”他说，“不扣，希望你能早一点去。”我说，“我绝不会去。”就僵持了很久，这是 79 年。在组织调动方面，因为我在拉中旁边，经常找他们谈话。到了 80 年，他们不知道出于什么东西又开始讲得很厉害了，又下了个文件，具体的罪行我没抄，记不太清楚了。就是说，“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，有的是罪行。现在区党委研究决定，对陶长松开除公职，查看留用两年。”当时我就说这个任荣太没有气魄了，开除留用干啥，干脆开除。

当时决定让我养猪。拉中也不好安排，叫我养猪。我这个人比较开朗，我说，“养什么猪啊？看看。”一看就是七条猪，我说，“你这七条猪都要死不活的。记清楚了啊，七条猪。饲料怎么解决，燃料怎么解决。”这几个家伙也没有思想准备，我就锁，“再研究研究。”饲料根本就没有，给我弄了柴火。我说柴火也行，没有饲料，我就整天烧水炒菜。他们看我也不老实，因为拉中的地我也很熟悉，我就从拉中的菜地里拿菜。反正小管子一推，菜往猪圈一弄，每天工作四十五分钟结束，顺便去菜地里扒一点菜自己回去种。

后来也没到时间，到了 80 年底，我说，“行啦，我造反了！这个钥匙给你们了，我不管了！我要分成！现在这个猪有 23 头，发达了，这个提成怎么提？”

有时候会有小当兵的过来买猪，我说你们自己逮，我现在也逮不住它。我跟他们开玩笑...反正这个就搞了一段。

我说西藏这个事有时候就是个笑话。后来是宣布开除留用。公安局一处的处长刘文宗跟我说，“陶长松同志，你现在生活费太少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看守所一年半的钱就不用交了。”他不说话还好，他一说我就来气了。

问：他要你交那个钱？

答：是。一般规定的犯人要交钱。我这个算啥嘛，（他妈的）你也定不了我的罪，把我冤枉地关了一年半，算啥东西？我当时很生气，我说，“刘处长，你说的什么话？现在我自己掏钱，你这个监狱伙食费多少，我交。你去住一年半！”当时纪检委的说，“不要说这些了，不要说这些了。”我说这不像话嘛，我都没给你们提出精神损失费，还让我交伙食费？这什么意思？

我还和其他人保持接触，比如宋子元，我经常找他，问他，“结论怎么样了？”郭锡兰我也打过交道，他跟我说，“你这个事情太复杂了，你老不认错，我们怎么研究啊。”我说，“郭书记啊，我们老熟人了。你还不知道吗？叫我认什么错啊？我说你们提的这些东​​西能成立吗？我今天不为难你，我跟你讲一条，政治归政治，我说服不了你们，你们也说服不了我，不谈这些了，拿历史做检验。现在我们先解决经济问题、吃饭问题怎么样？”（笑）“行行行，就按照你这个意见办。”反正最后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，给我补了钱。用钱我也很潇洒，第一次补钱我就买了个黑白电视机，当时很少。第二次补钱我就买了彩电，我说我留作纪念。

跟郭锡兰说了这些话后，后面也比较顺利。到了 81 年我看老僵持下去也不行，我就报了中国社科院。

问：是当研究生？

答：不是研究生，是助理研究员。当时是有 27 个人报这个位置，最后剩下 3 个。我就在那 3 个里面。宋子元把我的名字划掉了，不让我报考。我就找到他，我说，“宋书记，那个招生简章你看过没有？”他说，“你这什么意思啊？”我说，“我什么意思你应该清楚啊，我报考了中国社科院，你为什么不同意啊？”他说，“谁告诉你的？”（笑）我说，“你不要问谁说的，你就说你到底干这个事情没有？”我当时跟他说话不客气，他听我这么一说，他也露出了真面貌，“你就不应该报考，你现在什么人啊？报考那个东西？”我说，“招生简章怎么写的你搞清楚没有？劳改释放犯都可以参加考试，我现在还算不上劳改犯吧？更不是劳改释放犯吧？现在我犯人都不是，为什么不能报考？”一下子把他问住了，半天回不上话。我说，“你现在手上有些可怜的权势，这东西有什么了不得？”把他数落一通，他后来很生气，“以后你的事情，我根本不过问！”我说，“你不过问我谢天谢地，我还怕你过问，你一过问我的事就麻烦。”

后来成立了西藏社科院。“两案”专案组的人就跟我讲，他们知道这个情况，“不让你报考是区党委的错。”他不敢讲宋子元的错误，将的是区党委的错误。他们说，“作为补偿，你既然有这方面的才能，有这方面的爱好，马上要成立西藏社科院了，你去不去？”我说，“西藏社科院谁负责？”“多杰才旦嘛，你都很熟悉的。”（笑）他们也知道。我说可以考虑。后来没有多久，多杰才旦给我打电话...当时没电话，他叫儿子来通知我，让我去一下。我一去，就谈西藏社科院这个事情，西藏社科院正在筹备，马上搞西藏研究。“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？有兴趣干的话，我们谈过以后马上就开始工作。”当时是 81 年 6 月份，我说，“行吧，跟你干就干！”所以我后来就到西藏研究所了。